



中国经济双重转型的启示

□ 厉以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走出了体制转型和发展转型叠加的双重转型之路,也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现代化社会。这两种转型的叠加在世界上没有先例。因此,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双重转型构成了独特的改革开放之路,也为发展经济学增添了新的内容。

首先,转型要从最薄弱的环节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最薄弱的环节是什么?是农业。农业是薄弱环节,农民的改革愿望最强,改变计划经济体制的突破点就在农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先动起来,“大包干”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的突破性进展带动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形成了势不可当的改革潮流。

其次,最要紧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上世纪80年代,农村搞了“大包干”,粮食大幅增产,农民能吃饱而且有积极性了,于是农民开始向城市、向建筑工地流动,寻找就业机会。人流动起来,劳动力就多了,这是中国一个大变化的开始。有了劳动力,自己建厂房,到工厂去买下脚料作为原材料,乡镇企业就发展起来了。乡镇企业产品的推销者走遍全国,也带活了全国的经济。可见,只要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会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活力和生产力。

DOI:10.14061/j.cnki.cn13-1033/d.2016.11.022

我国劳动力成本真的过高了吗?

□ 宋晓梧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把适应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调整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工作的重要内容。需要特别指出,合理提高劳动者,尤其是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是走向新常态的题中应有之义。

针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现状,劳动力成本是否已得到合理提高,经济发展成果是否被合理共享,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绝不是一些人所主张的,经济迈向新常态,需进一步压低劳动力成本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缺乏资金、没有技术,唯一的优势就是劳动力价格低。依靠出口加工、来料加工逐步积累了大量外汇,低劳动力成本竞争也使我国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一直较低,且从2000年呈明显下降趋势。这是造成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低迷的重要原因。日本、韩国的消费率已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了,中国比这两个国家还低

第三,把产权改革放在重要位置。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我在北京大学的礼堂做了一场报告,第一句话就是中国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中国改革的成功必然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国有企业不改革,光放开价格有什么用?一定要进行产权改革,明确产权,走股份制的路。这些话引起了一场论战。经过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我们明确了股份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在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把产权改革放在重要位置,这是中国的实践为发展经济学作出的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第四,注重解决就业和民生问题。在双重转型过程中,把大锅饭打破了,把铁饭碗打破了,如果就业问题不解决,民生没有得到改善,社会就不稳定。我们在改革中解决了国有企业工人下岗问题,加大城乡社会保障力度,使民生得到持续改善,保障了双重转型的顺利进行。对民生的投入实际上是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使我们拥有了素质高、讲纪律的产业工人队伍,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的。一个企业家对我说,当初看到东南亚的工资比我们低,就把工厂搬到那里,结果非常后悔。一是东南亚的工人没有中国工人讲纪律,上班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二是他们不像中国工人那样愿意努力学习技能。这告诉我们,对就业和民生的投入有利于长远发展,是很值得的。

去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了50%,



得多,近年来不到40%。因此,讨论新常态,不能说只说投资、能源、环境问题,更不能局限在百分之几的增速上,必须把合理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提到重要议事日程。

近几年,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劳动报酬占GNI的比重从2008年的48.5%回升到2013年的51.1%,但还没有达到2000年的53%。许多企业已经抱怨劳动力成本提高太快,造成企业经营困难。正是基于这一点,一些官员和学者认为中国劳动力成本已经过高了。



这是现代工业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标志,表明我国已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下一步的发展需要注意三件事情。

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一是让产品更加个性化,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二是让服务业更加人性化,服务得更周到。三是提高品牌的国际知名度。中国品牌学会的同志告诉我,他们经常向来中国采购货物的外国商人发调查问卷,题目是您所熟悉的中国制造业著名品牌。答案只有一项最多,就是茅台酒。这说明大多数中国品牌的国际影响力还远远不够。四是把消费留在国内。我国消费者现在拼命到外国去买东西,为什么?因为同样的商品,外国的价格比中国便宜,还不用担心买到假货。这个状况一定要改变。

不要忘记中国工业化尚未实现。虽然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了50%,但工业化还没有实现。因为我们与建成制造业强国这个工业化目标还有距离,必须向这个目标继续努力。

要看到中国的农业大有发展前途。现在农村正在进行的土地确权深得民心。土地确权使农民的承包地经营权有经营权证,宅基地的使用权有使用权证,宅基地上盖的房子有房产证,农民就可以抵押贷款,可以去开店、做生意,这样农村就活了。土地确权以后,农民自愿入股搞合作化经营;农业实现规模经营,就能搞好。一些地方的实践还表明,在土地确权以后,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的差距大大缩小了。

(据《人民日报》)

从宏观看,在农业劳动力转移增量与新增劳动力总量都逐年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既有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又有发展方式转型要求的制度性“反弹”。但至今,普通劳动者总体工资福利水平仍然偏低,应当还有增长的空间。从微观层面看,不少企业抱怨近年来经营成本上升过快,企业效益下降,外商和许多本国企业转向境外投资。

能否得出这样的结论,前阶段中国过低的劳动力成本掩盖了其他成本过高的弊端,在其他成本不减少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就给企业造成了很大压力,而劳动力成本的合理提高,有助于政府重新审视并改善企业的总体经营环境。

应当承认,虽然总体劳动力成本较低,但是我国确有一部分从业人员的成本过高了,那就是垄断行业职工和相当一部分国企高管的工资福利过高。如果把这部分人的劳动力成本单列,普通劳动者的报酬比重将更加低下。

总之,新常态下要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全面小康,收入分配问题不容小觑,普通劳动者收入如何有效增长,能否实现共享发展,是值得审慎思考的问题。

(据《北京日报》)



DOI:10.14061/j.cnki.cn13-1033/d.2016.11.023

精准扶贫 也是一场供给侧改革

□ 高亚洲

3月8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湖南代表团参加审议。总书记对湖南的一些实际问题,提出了非常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特别是提到精准扶贫时,他对十八洞村的印象特别深刻,对每个人、每件事都记得非常清楚,娓娓而谈。

从某种意义上说,扶贫是社会收入的再分配,而收入分配则事关社会公正。因此,通过扶贫,建立合理公平的收入分配秩序,也一直是中国政府的不懈追求,自然也是我们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征程中,必须正视的重大命题。它的最终目标是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使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实现最大范围的公平和合理,并最终回归到社会公平正义上来。

在繁重的脱贫任务中,如何科学、高效地完成,是面临的首要问题。无论是在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还是在地方的专项调研中,习近平不厌其烦地提到一个词语——精准扶贫,事实上,精准扶贫,是习近平在湖南十八洞村考察时正式提出的。在贵州的调研座谈会上,习近平对精准的价值如此说道——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

这里的“精准”应是两个紧密关联的向度,一是对贫困人群的精准识别。只有真正了解哪些是需要帮扶的困难户或是贫困地区,才能提高精确识别。这是精准扶贫的前提。在这次审议会上,习近平对他去过的十八洞村的熟悉,让许多代表惊讶不已。应该说,习近平对调研地区的如数家珍,本身